

耿刘同 耿引循

佛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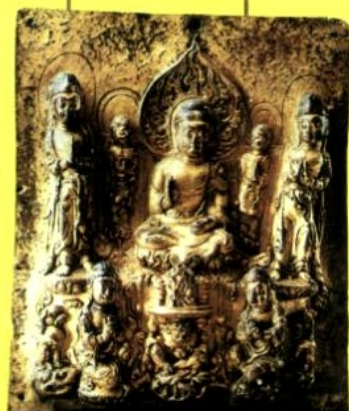
与

中医学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赵朴初题



IXUE

佛学与中医学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赵朴初题



耿刘同 耿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226173

PDG

(闽)新登字 03 号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佛学与中医学

耿列周 耿引循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科发电脑排版服务公司排版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4.5 印张 2 插页 10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200

ISBN 7—5335—0753—3/R · 161

定价:3.75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数字图书馆
PDG

序

中国传统医药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华夏文明息息相通。我从医四十年，临床诊疗之余，着力涉猎卷帙浩瀚的中医药学典籍，深深感觉到中国传统医药学思维和现代医药学有诸多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医药学在哲理上重视宏观思辨性，与后者比较，很具特色，在它身上，处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脉络，看到中国医药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或嚆矢；这使我对探讨光辉耀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间的血缘关系，滋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

《周易》以阳爻(—)和阴爻(--)为标帜所展示的阴阳概念，是日后传统中医药学阴阳理论的哲学背景；我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李聃《道德经》关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的议论，也可体察到中医药学中关于“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理论体系的特色和“天地是大宇宙，人身是小宇宙”的道文化的历史轨迹。《庄子》称：“易以道阴阳”，在中医临床诊疗中，阴阳辨证是中医最基本的诊断模式，据此得以立法处方。中医药学最有权权威性的典籍《黄帝内经》不少章节，也是在老子“养生之道”的基础上发挥的，因而世有“黄老之学”之谓。庄周宗老子之论，有《养生主》独立篇章，并提倡老子静态气功，实为今日丰富多彩传统养生术之滥觞。《道藏》中的《钟离八段锦》、《太清导引养生经》，更是影响深远，流传至今，富实用性特点。

我出生福建，幼年时代在家居和社会间里中，几乎天天看到“求佛给众生治病”的举动，这也许就是不少香港老百姓所说的“佛

2/02/06

是大医王”、“佛是大药师”的意思。《药师经》称“老、病、死”是人的生理上的三种病，“贪、瞋、痴”是人的心理上的三种病；《大藏经》的论述医理，《易筋经》及《延寿经》之历久不衰，以及以“戒学”为基础的“佛家气功”，物我两忘的“坐忘”，今人仍在汲取其精华而行于保健防病。印度传统医学受佛学影响也很深，足迹未泯，所以 1981 年出访印度时，我对参观位于恒河沿岸之瓦拉纳西 (Varanasi) 的释迦牟尼故乡的佛教殿堂倍感兴趣。

说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中华文化大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还有更多生动的实例。《尚书·洪范》五行体系之在中医药学术中的兴替；《吕氏春秋》“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的音乐舞蹈疗法思路，对后人皆多所启迪。至于殷墟甲骨文卜辞，马王堆汉墓帛书，龙门石窟医方及敦煌所见之中医药文化，皆十分诱人。他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周书·五会篇》及《汉书·平帝本纪》关于医疗养生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间之种种胶柱。

为了比较系统地阐发华夏文化与传统医学的因缘，三年前，在我回福建省亲时，与福建科技出版社谈及出版丛书的萌想，不意竟得到他们的很大共鸣，多方支持和鼓励。为此，我们着手这一比较吃力的工程。《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将囊括中医学与远古文化、周易、儒文化、道文化、佛学、兵家、文物学、饮食文化、传统美学、文学、艺术、天文学、象数、史学、典章制度、民族学及民俗学等之间的联系，探隐溯源，继承发展。

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我们衷心感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俞长荣教授俯任顾

问。赵朴初先生在与本丛书《佛学与中医学》作者耿刘同、耿引循访谈时，还曾议论了荀子“食气者寿”、孔子“治人事天莫为啬”、庄子“性与天道”及老子“心物不二”的论点与中医学及养生学的关系，至为可贵。

我希望本丛书对于开创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探究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种种奥秘，起到那怕是一些推陈致新、继往开来的用处，就很满足了。丛书中各分册作者的学术观点可能不尽一致，有些是历来便有争议的，为了尊重各流派的观点，不强作统一，留供大家作进一步争鸣，而后完善。是为序。

陈可冀

壬申年霜降日于北京西苑

同年冬至日改写

序

两汉以来，象教弘于中土，医佛之因缘，既接于天竺之方药，更接于释典之义理。或曰：佛渡人以出世，医救人以寿康，其义理一乎？余曰：均俱慈悲之心，而普济众生，法门不二。

史多医家精研佛理者，佛家通晓医理者，每融汇无痕，而寓于德，以德行道，先贤所倡导，后世所发扬，当传永远。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可冀教授主编《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倩余为顾问，又以《佛学与中医学》一题委之余长子刘同、小女引循执笔，今已完稿，审读一过，欣然序之。

癸酉春日 扬州 耿鉴庭

引 言

在古代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宗教的传播,既是一个交流的内容,又是一个交流的重要媒介。佛教传入中国,把印度的医学带到了中国;同时,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汉化,又溶进了许多中国医学的成分;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传播过程中,又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医药学发展。虽然,印度医药与中国医药的国际传播,佛教并非唯一载体,但其影响是相当深刻和广泛的。

作为上层建筑思想文化范畴的佛教,有着极为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它自己所表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它许多基本教义及其衍化阐述中,都触及生老病死,并以此为出发点,不断丰富其理论及实践。在佛学的五明中,医方明是医药的专门学问。这些都决定了佛学与世俗现实社会中的医药学的密切关系。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并奠定了直至现代仍然遵循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从这个前提出发,随着佛教渗入的医药学知识,只是对中国固有医药的丰富和补充。在指导中国医药发展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现象对进入中国的佛教哲学及其文化进行推演、融合、同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佛教依附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异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这些宗派的建立,对中国各种文化门类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中包括医药学。东亚地区从中国引进的佛教,也正是这些经

过中国文化加工的教派，弘扬这些教派的代表人物，往往是通晓中国医药，或者是精通中国医药的高僧大德。当回溯这些国际文化交流往事的时候，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医药学无疑占有重要的篇章。但是，佛学与中医学的研究，又不只是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去立论，它们之间有着更为深刻的哲理渊源。

目 录

序	陈可冀
序	耿鉴庭
引 言	(1)
第一章 印度佛教及其汉化	(1)
第一节 佛学的起源	(1)
第二节 两汉社会与佛教的传入	(8)
第三节 中国佛学及其宗派	(13)
第四节 中国佛教的文化形态	(21)
第二章 佛教的传播与中医学的发展	(27)
第一节 佛教传入前的中医学成就	(27)
第二节 佛教在我国早期的传播及对中医学的影响	(34)
第三节 隋唐时期佛教之兴盛及与中医学的关系	(39)
第四节 五代宋元明清时期的佛学与中医学	(44)
第三章 佛理与医理的异同	(53)
第一节 四大与五行	(53)
第二节 中道与整体平衡观	(57)
第三节 缘起法与天人相应观	(60)
第四节 无常与恒动	(65)
第五节 三学与养阴	(68)
第四章 渗入中医学的佛学与印度医学	(71)
第一节 大慈大悲与救死扶伤	(71)
第二节 僧人与专科	(73)

第三节	阿魏与人参·····	(78)
第四节	咒禁与心理疗法·····	(81)
第五节	素食制度与饮食疗法·····	(83)
第六节	饮茶与茶叶的食疗·····	(85)
第七节	寺院音乐与音乐疗法·····	(87)
第八节	禅与气功·····	(89)
第九节	密宗与西藏医学·····	(109)
第五章	为佛学与中医学的融汇作出贡献的僧俗人物·····	(122)
第一节	僧人行医与医家信佛·····	(122)
第二节	为中医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历代僧侣·····	(124)
第三节	致力于佛学与中医学融汇的历代医家·····	(127)
结 语	·····	(131)

第一章 印度佛教及其汉化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前 5 世纪的古代印度。公元前 3 世纪,佛教超越印度本土,远传斯里兰卡、缅甸、叙利亚、埃及等国家。特别是公元 1 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后,有了很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我国成为佛教传播的又一辐射中心。朝鲜、日本等国佛教的兴起,均源于中国。信仰佛教的国家,以亚洲为主,如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举国信佛,有“佛国”之称。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美国也先后成立了一些佛教僧团组织和佛教研究机构,使佛教成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它只是被当作皇家的一种御用品。统治阶级将它作为又一种神仙方术,看作与黄老并列的祠祀化的东西。随着佛教的传播、汉化,到了隋唐进入鼎盛时期,达到中国佛教之顶峰。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中国佛教也相应地每况愈下。

第一节 佛学的起源

佛教创始于古代印度。

古代印度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出现一种“种姓”制度。这种制度规定,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不能通婚、交往,甚至不能共食、并坐。当时社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婆罗门是控制宗教祭祀权的僧侣阶层,是最高阶层,是神权的代表。其次是刹帝利,他们是包括具有军权的国王和武士阶层的军

事贵族集团。第三等级的种姓吠舍，是具有人身自由的普通部落村社成员，他们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劳动。最下等级的种姓，称为首陀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部落战争阶级分化过程中破产的农民，失去吠舍身份的人，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他们沦为仆役，也有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首陀罗种姓，不能与其它种姓通婚，是社会地位极端低下的农奴贱民。当时，统治阶级就散布神话：婆罗门是造物神梵天用口创造出来的，刹帝利是用两臂创造的，而吠舍和首陀罗却是梵天用两股和两脚所创造。各种姓之间的地位悬殊，从这个神话中也体现了出来。这种明显的人的不平等，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倡导的众生平等，正说明了佛教起源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的产生，是有着一定进步意义的。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姓乔答摩（过去译为瞿昙），名悉达多，生活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之间。东南亚佛教国家，曾以1956年作为他涅槃2500周年纪念，按这个说法，释迦牟尼去世于公元前544年，而生于公元前624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有的学者还算出释迦牟尼比孔子早逝7年。

悉达多出生于释迦族聚居的迦毗罗卫城，这个地方位于喜玛拉雅山下，在今尼泊尔境内，当时是拘萨罗国的属国。释迦牟尼的父亲是迦毗罗卫的国王，名首图驮那，汉译为净饭王；母亲是天臂城主的女儿摩诃摩耶。印度古代风俗，妇女要回到娘家分娩，摩耶夫人在临产前回到与迦毗罗卫隔河相对的天臂城途中的兰毗尼园（也在今尼泊尔境内），生下了王子悉达多。7天以后，摩耶夫人去世，悉达多由姨母摩诃波闍波提抚养。

悉达多从小在宫廷内长大，所受教育严格，生活豪奢，成年后娶了同族摩诃那摩长者的女儿耶输陀罗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罗喉罗。

悉达多家族虽属于刹帝利种姓，但由于当时印度农业、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奴隶主大国不断发动对小国兼并的战争，还有一些曾受婆罗门压迫的贱民在社会动荡中踏上了统治者地位。日益尖锐的矛盾展现在这位养尊处优的年轻的王位继承人面前，惹起了悉达多太子的思考。即使在出游四门的娱乐中，他所见到的生、老、病、死的不可解脱的痛苦，时刻折磨着他；甚至陪伴他欢度良宵的妃嫔们的柔姿媚态，在他眼前也都化作了魔鬼夜叉般的丑恶。现实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这一切都成为他佛家思想认识论的出发点。排除神话的种种渲染，悉达多确实抛弃了王位的继承，逾城出走了，成为佛教的第一个出家人，这年他 29 岁。据说，在众多的世间痛苦面前，他曾在北门得到一位沙门（修道者）的启示，使他肃然起敬，而采取了出家的行动；他剃除须发，披上袈裟，也成了一个寻求解脱的沙门。

走失了太子的净饭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选派了同族子弟侨陈如等 5 人，也出家成了沙门，和悉达多太子结伴，并随时进行照顾。

太子出家是为了寻求解脱生死、摒除苦恼的方法。他访问了毗舍离、摩伽陀等地的许多著名的苦行者和沙门，未能得到使他满意的答案。后来，他又经过在苦行林中的 6 年苦修，非但没有得到解脱，反而弄得皮骨相连，像似一具活的骷髅（后来佛教所供奉的一种极瘦的释迦像，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时期的释迦苦行像的）。于是，他带着侨陈如等 5 人走出伽耶城南优楼频螺村的苦行林，在尼连禅河洗净了身体，饮用了一位牧羊女供献的乳糜，恢复了体力。侨陈如等人看到了这些情景，以为太子放弃了追求，便都离他而去，北渡恒河，到鹿野苑去修行。

其实，悉达多太子并未放弃初衷，他坚定信心，走向伽耶城外的毕钵罗树下静坐，苦思冥想，以求解脱人生苦难的方法。这是一

个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过程，要把种种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和诱惑加以排除，从而达到清净的思想境界。在“若不成佛道，决不起此座”的大决心之下，他终于在天将破晓明星出现的时候，顿然彻悟，确信已经寻求到了人生痛苦的本源，断除生老病死的根本，使贪、嗔、痴惹起的种种烦恼不再发生。以此为界，悉达多太子终于成道，成为佛陀。后来就把这一树下省悟的过程形象地说成是群魔乱舞，对悉达多太子进行种种勾引、诱惑，而悉达多太子不为所动，终成正果。这个过程，也就叫做降魔成道。这一年悉达多 35 岁。因为佛陀是在毕钵罗树下成道的，后来毕钵罗树就称做菩提树。“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在以后的长时期内，佛教在没有兴起偶像崇拜以前，菩提树及其雕刻绘画的形象已是皈依佛教徒众们顶礼膜拜的圣物。

我们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释迦牟尼成道的过程，是为了给本书读者一个源于生老病死的痛苦而激发出的哲人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即使是现代医药学，也未能离开对生老病死的研究和实践。

作为原始佛教或者是佛教在古印度的形成阶段，它所追求解脱的是人生问题，而很少甚至根本就不是要直接去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佛教和其它宗教一样，在后来发展衍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为了取得存在的地位，或者是出于阶级社会相对立的阶级的各自需要，才愈来愈多地成为社会的问题，成为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且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变，努力寻找自身在上层建筑中的坐标位置。这样，它便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广泛的社会生活面，渗透到各个阶层，成为芸芸众生在现实无法解释的现象面前一种无所不能的补充，救苦救难的救世主的抽象的或者是形象的确立，也包涵了人类与自然斗争，与生老病死斗争所取得的经验的实证和已经总结的理论成果的大量功德。一切宗教中的医药学成

分的存在,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宗教的强大的精神作用,通过虔诚的信仰,又将这些体育的或药物的医疗实践作用加以神圣的升华,而达到一个机械唯物论所不可解释的充满神奇效应的既虚幻又实在的大千世界。正统的中医学,没有排斥这些外来的异国神乎其神的医身医心的医术,既吸取其合理的部分,又将取得的成就渗入到佛教的典籍和组织之中,加以推广,普济众生。

在菩提树下得道的 35 岁的悉达多,首先去到波罗奈城,召回了离他而去的 5 位侍者,在鹿野苑中向他们宣示了自己证悟的佛法。这 5 位侍者不但成为第一批聆听佛法的人,而且都皈依了佛法,成为释迦牟尼的第一批弟子。佛教史上将这次说法称做“初转法轮”。“初转法轮”标志着作为宗教传播的佛法的三个主要部分的具备和佛教的产生。这三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宝”,即佛、法、僧。佛,便是得道的悉达多·释迦牟尼;法,指苦集天道的“四谛”;僧,是出家弟子,初转法轮时只有侨陈如等 5 人。

“四谛”作为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佛学的四条真理。具体地说,“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观察世俗世界人生而得出的认识,归纳成一个苦字。其中除生、老、病、死四种苦以外,还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盛共八种苦。集谛分析世间人生造成痛苦的原因,是由于贪嗔愚痴错误的行动和语言造成的后果,即所谓身、语、意三业。“业”便成为佛教的专门用词,它有着特定的涵义,在佛学中使用非常广泛。灭谛是说要断除造成苦果的一切原因,须归结到“解脱”、“涅槃”这样的佛教最高理想境界。而道谛是到达最高境界的道路和方法。苦、集、灭、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无异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表述过程,正像从病情观察,病因分析,到医疗方案的制定和施治。苦谛所列举的八种苦,和痛苦时的苦,快乐结束时的苦,不苦不乐被无常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苦,此所谓三苦的列举类聚,正是致病的原因。先秦诸子

有关养生的许多论述，同佛家这些基本论点，有许多相通之处。两汉时期渗透在艺文典籍中的许多养生观点也证明了这一点。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学与佛学的关系，似乎可以从其思想理论上加以认识。

“初转法轮”以后的释迦牟尼，在各地旅行播道，影响越来越大。拜火教的大迦叶三兄弟和舍利弗目犍连等德高望重的学者，也都带来自己的信徒归依了佛法，参加了佛教最早的僧团。后来，许多国家的国王和贵族也都信奉了佛教。在他返回故土迦毗罗卫城的时候，他的儿子罗喉罗、族兄和他的姨母也都在他的教化之下出家归依了佛法。

释迦牟尼带着他所组建的僧团，在恒河流域，既弘扬佛法，又不断地完善着他的宗教组织，共 45 年。在他 80 岁的时候，终于侧身安卧在拘尸那伽城外的两株娑罗树之间，得到了圆满的静寂，而安然离开了那充满痛苦的人生。这便是佛法所追求的“涅槃”境界。我们至今所能见到的卧佛的形象便是记述释迦毕生事迹的八相成道的最后一相涅槃相。无论是经书描写，还是艺术形象表现，释迦涅槃时，众弟子悲恸不已，震动天地，纯乎一片人之常情。释迦火化以后，还有八王分争舍利之说。舍利即是佛的身骨，这些舍利，后来有的被中国西行求法的高僧迎奉至汉地造塔供养，中国始有佛牙舍利、佛指舍利塔的存在，也才有如唐代韩愈《谏迎佛骨表》等著名文章的出现，此是后话。

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 100 年中，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基本上保持着佛陀在世时的情况，徒众们严格按教义行事，保持着内部的统一。这个时期，被称做“原始佛教”时期。但是由于后来对教义和戒律的不同理解和纷争，而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部派”，佛教进入了“部派佛教”时期。由于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等人的大力倡导，这一时期的佛教有很大的发展，开始走出印度国门，播扬